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
暨第二届亚洲文明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岳麓书社

083

2

4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 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

(代前言)

何介钧

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起和主办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8月15—18日在长沙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中国大陆的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美国、泰国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学者,共88人。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湖南省史前考古成果展览,会后绝大部分代表还考察了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早期城址。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有关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华南旧石器文化

近十年来,湖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取得重大发展,对深入了解华南旧石器文化传统有特殊的价值。与会代表认为:更新世早期以后逐渐形成的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对华南旧石器文化传统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影响了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其中作用最大的是更新世期间本地区的气候特点,即以温暖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为主,在大部分时间里,气候的变化幅度有限,因而与此相适应的砾石石器工业能够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到晚更新世,特别是在最后冰期最盛期,气候变化对石器工业的影响明显增强,促使砾石石器向石片石器工业转变。湖南的研究者从该省西部迄今为止发现的160余处旧石器地点和遗址的实物资料出发,侧重从类型学、器类组合的角度,结合地理环境的特征,总结了澧水流域和沅水中游(中、下游以五强溪峡谷为界)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将湖南西部的旧石器文化进行两个层次的文化类型划分,在宏观上划分为溁水(沅水的支流)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群,而在微观上分别划分出两个文化类群的早、中、晚阶段性旧石器文化或代表性遗存。并将湖南旧石器文化与周邻地区旧石器文化进行对比研究,讨论湖南旧石器文化在我国旧石器文化中的地位。他们认为,华南砾石石器文化主要是指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以砾石石器工业为主导,以砍砸器、大型尖刃石器、刮削器为基本组合的旧石器文化。从宏观上看,以砾石三棱尖状器和石球的分布状态可以将华南砾石石器工业区分为北部亚区和南部亚区。北部亚区广泛分布砾石三棱尖状器和石球,南部亚区则至今未发现砾石三棱尖状器和石球。溁水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群正好属南北两个亚区相邻的区域性文化,溁水类群处于南部亚区的最北部,而澧水类群处于北部亚区的最南部。

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

就此问题提交会议的论文和大会发言中，存在着两种分歧较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南方系统又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在发展的历程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相互影响，约在距今 5000 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文化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屈家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晚期基本上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但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传统仍有部分保留，表现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

另一种观点认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指距今 7000 年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目前仅鄂西南和洞庭湖地区资料较为丰富，考古学界提出了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等名称。但实质上城背溪遗址的文化遗存较早的部分相当于彭头山文化的晚期，而较晚的部分相当于皂市下层文化的早期。虽然鄂西南和洞庭湖区存在相差异的因素，但总体内涵中，共同因素是主要的。经过数百年的过渡，在距今 6300—6500 年左右，大溪文化成为两湖平原占主导地位的考古学文化。而在这一时期，汉水以东存在着一种区域性的，同样以红陶系为主的文化，即边畈文化（指钟祥边畈遗址第一、二期遗存），这实际是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的余绪。而至距今 6000 年或稍晚，大溪文化越过汉水向东发展，分布区域大大扩展，将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往北压缩，从而形成了鄂西南的关庙山类型、洞庭湖西北岸的划城岗类型（或称三元宫类型）、汉水以东的油子岭类型，会上有代表提出还可增加一个洞庭湖北岸乃至武昌以东的车轱山类型，并认为其中关庙山类型处于核心区域，代表最典型的大溪文化，而其它几个类型均较多地包含有相邻其它文化的因素。至大溪文化第四期，这几个类型更加趋同和接近，并由东向西，程度不同地接受长江下游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如由红陶系转变为以黑陶系为主，鼎、壶、豆等器形和弦纹的流行，石钺的使用等，开始孕育出屈家岭文化，并最终转变为屈家岭文化的几个地域类型，即汉东的屈家岭类型、鄂西南的关庙山类型（或称清水滩类型）、鄂西北至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湘西北的划城岗类型、孝感和黄冈等地区的螺蛳山类型。

两种观点根本对立，前者认为汉东以红陶系为主的油子岭文化不断冲击渗透，造成了大溪文化的消亡，源于油子岭文化的屈家岭文化最终替代了大溪文化。而后者认为，油子岭文化遗存实际是大溪文化发展到汉东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它终止了边畈文化的发展进程。因此，屈家岭文化是大溪文化晚期在发展转变过程中不断吸收长江下游众多文化因素的产物，从主体说来，两者属同一谱系。

会议期间，展示了湘江中下游、资水下游和沅水中上游近十年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收获。这些地区相同的都接受了洞庭湖区原始文化的巨大影响，但又存在着众多的差异，可以建立各自的文化谱系。湘江中下游和资水下游的文化谱系，湖南的研究者主张用南托（长沙县）文化、堆子岭（湘潭县）文化、岱子坪（湘乡县）一期遗存命名在石家河文化进入此地区之前的各个发展阶段，在编年上基本可以与洞庭湖区的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早期遗存（有人将其称为汤家岗文化，指皂市下层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一个阶段）、大溪文化、屈家

岭文化相对应。石家河文化进入之后,在这一地区形成岱子坪(湘中)和舵上坪(湘东北)两个地域类型。沅水中上游地区在石家河文化之前的原始文化,可依次用高庙(黔阳县)文化、松溪口(辰溪县)文化以及屈家岭文化高坎垄(怀化县)类型命名。在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一区域的北半部已是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而在南半部。则是与岭南同时期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竿篷坡(靖州市)中期遗存,或可称之为竿篷坡文化。

三、关于稻作农业的起源

70年代,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当时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由于其形态已接近现代的栽培稻,数量又十分巨大,并且伴出大量水田农具,所以不少人推测当地还应有更早的稻谷栽培历史,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中心,但目前在长江下游更早的稻谷遗存尚在探寻中。而在长江中游地区,随着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前段遗址的发现,这一课题已获得一定的突破。在距今超过8000年的彭头山文化的诸遗址如彭头山、李家岗、八十垱、坟山堡、城背溪、枝城北等地点,均发现了栽培稻的材料,因而不少研究者提出长江中游较之下游有可能更早出现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有代表认为,古地理学和古地质学的研究表明,当彭头山文化在洞庭湖地区兴起时,太湖地区与苏、沪、杭平原以及余姚平原、宁波奉化平原等沿海地带,地貌是湖沼或浅海,这种地理环境不适宜水稻栽培。因此,河姆渡和罗家角成熟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外来的,而非在本地形成的。但多数与会者认为,将长江中下游视为一个大的稻作农业起源区,就目前的资料看还是较为妥当的。

有的研究者比较了以甌皮岩—黄岩洞为代表的华南地区和以彭头山—城背溪—皂市(下层)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距今10000—7000年间两个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及其发展的不平衡,并论证了生态环境的差别如何影响了早期农业发展的模式。在栽培稻起源的探索中,位于北纬 $25^{\circ}18'$ 的甌皮岩洞穴被认为是较有希望的一处,但在该遗址发掘及多次采样的资料中,至今未找到稻谷或可以说明栽培稻存在的物证;而目前发现栽培稻的几处早期遗址如彭头山、城背溪、河姆渡、罗家角,它们的地理位置都在北纬 $29^{\circ}36'—30^{\circ}36'$ 之内。上述情况可以说明我国全新世初期稻作农业的最早发生,与温带地区一定纬度的生态环境有关。热带、亚热带的华南地区尽管有丰富的草木本植物资源,但发达的园圃农业模式造成了甌皮岩—黄岩洞遗址群农业发展的停滞性。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介绍了用现代技术手段和方法研究农业起源的进展。据日本学者介绍,用电脑处理得出的树枝状谱系图显示出不同类型栽培稻与野生稻的亲缘关系,从遗传学上来看是有远近区别的,这种遗传上的差距将野生稻和栽培稻分为两组,刚好与印度类型和日本类型对应。在日本稻类型中,不论是野生稻和栽培稻都有叶绿体DNA的存在,而印度稻类型中已没有叶绿体DNA的存在。基于这一事实,他们提出日本稻类型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观点。此外,目前一些遗传学家用水稻硅酸体的双峰是否对称来鉴别野生稻和栽培稻。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孢粉实验室通过对茶陵、江永的2种普通野生稻和19种栽培稻的水稻稻谷双峰硅酸体的观测分析,加上对28种稻谷表面形态的研究,发现所谓双峰硅酸体,实际上是稻谷表面的小刺状突起,栽培稻和野生稻的双峰硅酸体都存在对称与不对称的状态。对如何利用双峰硅酸体区别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长江中游早期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来,在长江中游地区陆续发现了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天门石河、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等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其中石河城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其余几座城址面积均在10万平方米左右。城头山城址已作了4年的连续发掘,揭露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对东、南、西南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出500余座墓葬,清理了多座有台基的房址以及完整的制陶作坊区和城中大道。其它几座城址或解剖了城墙,或试掘了城内的墓葬、居住址。城头山城址的筑城时代初步定为屈家岭文化早期,距今超过5000年,与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大体同时。另外,部分会议代表在现场考察时根据城墙解剖剖面提出,此城应为两次修筑,第一次筑城与大溪文化中期挖造的大围壕同时,超过5500年。作为4次发掘的主持者,我们在发掘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思考,今后准备再选择重点部位发掘重新加以检验。其余4座城可能为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筑造,废弃时间则均在石家河文化中期。

与会代表对这些早期城址兴废过程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原始农业是文明诞生的基础。长江中游稻作农业从距今9000年甚至更早即已出现。全新世中期,约在距今8000年左右全球性气候转暖,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4℃左右,这种气候更利于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繁衍,加上农业工具的改进,因此,从大溪文化开始,长江中游以水稻栽培为主体的原始农业有了更迅速的发展,产品出现了剩余。遗址分布密度增加,部分地区遗址呈现群状分布,聚落形态有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中心聚落和半从属聚落,还出现了专业性生产制作中心的遗址(如红花套遗址即可能是一处专业的石制品制作中心)。在上述背景下,出现城址不仅成为可能,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除此以外,作为外部因素的影响,大溪文化晚期,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呈现更加开放的态势。一方面大量接受长江下游同时期先进的文化因素,制陶技术、玉石制造技术、建筑技术以及农作技术都有重大发展。另一方面,又大举向北扩展,更多地与中原同时期文化交流融合。这种整体运动的态势,是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迅猛发展的外部因素。目前发现的5座城址,都是位于所属文化分布的的腹心地区。这一事实,证明此时城址出现的直接动力,不是因外部势力的侵入,而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

对于这批城址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城址筑造的屈家岭文化时期是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统一性最强的时期,城址与其附属聚落彼此之间有着先天的或历史的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特权阶层主要限于政治、军事、宗教上的权力。城址是中心聚落与其附属聚落共建共享,用以抵御争夺生存空间和财富的敌人。城乡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输送技术、交换产品及联姻和文化交流的关系。因此这类城址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是氏族制的高级阶段,即部落军事联盟阶段。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不设防的聚落到环壕聚落,再到建有城垣的城,是聚落形态变化的三个阶段,即由社会尚未分层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到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原始宗邑聚落形态,出现了中心聚落和从属聚落,进而出现了原始国家形态的城邑,即有人所称的“酋邦”或“古国”。城垣不只是建筑行为,也是政治行为,是权力的象征和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几座史前时期的古城,开始是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后来出现了凌驾于其它城之上的城,如规模达100万平方米的天门石河古城,似乎表明这一地区的史前民族——苗蛮集团已形成了其权力中心。至于长江中游5座古城在石家河文化中期均趋衰落乃至废弃的原因,认识基本相近,即认为由于这一地区民族

集团和文化的向北推进和一个大区域内权力中心的形成，从而引发了与中原华夏民族集团的大冲突，最后以失败告终，其在古史传说上的投影就是“禹征三苗”。

五、关于史前时期的精神产品及原始宗教

长江中游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在文化遗存中就出现了用物态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产品。如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和长沙南托大塘遗址所出 7000 年前的彩绘、刻划、篦印的神兽、太阳、凤鸟等纹饰的陶器，6500 年前安乡汤家岗遗址下层出现的各种饰复杂图案的印纹白陶盘，距今 5000 年的安乡划城岗屈家岭文化早期墓葬所出朱绘石钺，距今 4500 年左右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神像、龙、凤、鸮鹰、琮、璧等大量玉器以及陶塑人物、禽兽。会上有代表提出，对这些人工制品应从考古类型学按实用功能分类的框架中分解出来，将其置于史前人类意识形态的范畴中去考察，主张采用苏秉琦先生所提“艺术神器”的名称来表述和研究。同时，根据这些艺术神器的外观和艺术纹样，可将它们划分为寓意于灵、寓意于神和寓意于人格神三大类别。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为界，此前的艺术神器上不见神人的图像，以后的神器则已赋予了人格神的力量，从而成为古代文明业已发源的一个重要表征。

就距今 7000 年前后以洞庭湖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史前白陶（主要器形为圈足盘）所进行的论述。有代表认为白陶的器表装饰是贴塑法制陶工艺印迹的美化和升华，属雕塑型。其外表繁密精美的纹饰，只能在“举案齐眉”的状态时才能展现，应是“事神以致福”的礼器。汤家岗遗址出土的数件白陶盘外底的八角星图案很有代表性，它是一幅仰视的图像。岳阳坟山堡遗址皂市下层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八角形镂空垫座，应是八角星纹的早期形态，而安徽含山凌家滩玉牌上的图像，则是八角星的发展。不仅良渚玉琮的仰视展开图与此相近，在妇好墓及齐家文化铜镜上亦可见到类似的图案，在吴县澄湖古井中出土良渚文化贯耳壶上铭刻的刻划符号中也有它的形象。推测八角星图案中寄寓着“方位”或“天地”等有关的东方文化观念，进而认为白陶开始的以雕刻型装饰为特征的礼器系统，才是铜礼器的直接前身。

此外，提交会议的论文和发言中还涉及到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周邻（长江下游、岭南、中原）同时期文化的关系，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在中国文明乃至亚洲文明中的地位等问题。

（原载《考古》1996 年 2 期）

目 录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代前言)·····	何介钧(1)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中的几个问题·····	张森水(6)
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性类型及其地位·····	袁家荣(20)
关于磁砧法在旧石器时代技术中的意义·····	李炎贤(48)
环境因素与华南旧石器文化传统的形成·····	王幼平(55)
华南地区中石器文化特点初探·····	张镇洪(63)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初探·····	孟华平(74)
彭头山文化初论·····	裴安平(81)
试析湖南洞庭湖地区皂市下层文化的分期及其文化属性·····	尹检顺(105)
论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	向绪成(126)
洞庭湖区大溪文化研究·····	郭伟民(140)
附山园——黄家园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郭胜斌 罗仁林(167)
长沙南托遗址文化类型试析·····	黄纲正(177)
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	何介钧(183)
横亘东西的淮汉中介文化带——青莲岗—下王岗文化传统·····	石兴邦(210)
石家河文化玉器与江汉文明·····	王 劲(231)
浅说中国早期城的发现·····	张学海(243)
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址管窥·····	王红星(252)
从甑皮岩到彭头山——生态环境对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影响·····	曾 骐(261)
自然环境对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发展的影响·····	高广仁(267)
试论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白色陶器·····	牟永抗(273)
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的初步考察——《中国史前神器》纲要·····	贺 刚(280)
中国古代巫、巫术、巫术崇拜及其相关问题·····	童恩正(306)
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溯源·····	邵望平(326)
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亚洲文明·····	李 璠(332)
从江南看日本弥生文化的源流·····	安志敏(339)
长江流域原始文化与亚洲文明(提纲)·····	黄盛璋(345)

INDEX

- 1 A Brief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prehistoric cultures of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valley & the Second Meeting on Asian civilization (Preface)..... He Jiejun(1)
- 2 Some Problems on the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in china Zhang Senshui(6)
- 3 Regional variation of Hunan Paleolithic Cultures and it's significance
..... Yuan Jiarong(20)
- 4 A note on the anvil technique Li Yan-xian(48)
- 5 The Paleolithic environment and the Paleolithic of south China Wang Youping(55)
- 6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solithic Cultures in south China
..... Zhang Zhenghong(63)
- 7 A study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Genealogy of the Mid-Yangtze river district
..... Meng Huaping(74)
- 8 On the Pengtoushan culture Pei Anping(81)
- 9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Zaooshi lower level culture in Hunan Yin Jian Shun(105)
- 10 On typology of Guanmiaoshan, Daxi Culture Xian Xucheng(126)
- 11 A study of the Daxi culture in Lake Dongtinghu area Guo Weiming(140)
- 12 The discovery and studies of Fushan Yuan culture
..... Guo Shengbin and Luo Ren Ling(167)
- 13 An Analysis of the Datang Culture at Nantuo of Changsha ... Huang Gangzheng(177)
- 14 On Primitive cultures of Mid-Yangtze river District He Jiejun(183)
- 15 The Intermediate Cultural Zone of the Huaixhui-Hanshui Valleys;
the Qingliangan-Xiawangany Cultural Tradition Shi Xinbang(210)
- 16 Jades from the Shijiahe culture and the Jianhan civilization Wang Jin(231)
- 17 On discoveries of early city sites in China Zhang Xuihai(243)
- 18 On the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early Chalcolithic
..... Wang Hongxing(252)
- 19 From Zhengpiyan to Pengtousha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early Neolithic cultures Zhang Qi(261)
- 20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awenkou Culture
and Qujialin Culture Gao Guanren(267)
- 21 On the Prehistoric white Pottery of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 Mon Yong Kang(273)
- 22 On the artistic shenqi of prehistoric China He Gang(280)
- 23 On witch, witchcraft and witchcraft worship in ancient China ... Tong Enzheng(306)

- 24 In Search of the origin of witch-believing and witchcraft warshipping
in ancient Chu area Shao wang ping(326)
- 25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 in China and the Civihzation of Asia Li Fan(332)
- 26 The Ancient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origin of Japanese Yayoi culture
..... An Zhiming(339)
- 27 Drehistoric cultur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Asian civilizations
..... Huang Shengzhang(345)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 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

(代前言)

何介钧

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起和主办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8月15—18日在长沙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中国大陆的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美国、泰国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学者,共88人。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湖南省史前考古成果展览,会后绝大部分代表还考察了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早期城址。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有关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华南旧石器文化

近十年来,湖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取得重大发展,对深入了解华南旧石器文化传统有特殊的价值。与会代表认为:更新世早期以后逐渐形成的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对华南旧石器文化传统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影响了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其中作用最大的是更新世期间本地区的气候特点,即以温暖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为主,在大部分时间里,气候的变化幅度有限,因而与此相适应的砾石石器工业能够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到晚更新世,特别是在最后冰期最盛期,气候变化对石器工业的影响明显增强,促使砾石石器向石片石器工业转变。湖南的研究者从该省西部迄今为止发现的160余处旧石器地点和遗址的实物资料出发,侧重从类型学、器类组合的角度,结合地理环境的特征,总结了澧水流域和沅水中游(中、下游以五强溪峡谷为界)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将湖南西部的旧石器文化进行两个层次的文化类型划分,在宏观上划分为澧水(沅水的支流)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群,而在微观上分别划分出两个文化类群的早、中、晚阶段性旧石器文化或代表性遗存。并将湖南旧石器文化与周邻地区旧石器文化进行对比研究,讨论湖南旧石器文化在我国旧石器文化中的地位。他们认为,华南砾石石器文化主要是指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以砾石石器工业为主导,以砍砸器、大型尖刃石器、刮削器为基本组合的旧石器文化。从宏观上看,以砾石三棱尖状器和石球的分布状态可以将华南砾石石器工业区分为北部亚区和南部亚区。北部亚区广泛分布砾石三棱尖状器和石球,南部亚区则至今未发现砾石三棱尖状器和石球。澧水文化类群和沅水文化类群正好属南北两个亚区相邻的区域性文化,澧水类群处于南部亚区的最北部,而沅水类群处于北部亚区的最南部。

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

就此问题提交会议的论文和大会发言中，存在着两种分歧较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南方系统又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在发展的历程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相互影响，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文化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屈家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晚期基本上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但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传统仍有部分保留，表现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

另一种观点认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指距今7000年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目前仅鄂西南和洞庭湖地区资料较为丰富，考古学界提出了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等名称。但实质上城背溪遗址的文化遗存较早的部分相当于彭头山文化的晚期，而较晚的部分相当于皂市下层文化的早期。虽然鄂西南和洞庭湖区存在相差异的因素，但总体内涵中，共同因素是主要的。经过数百年的过渡，在距今6300—6500年左右，大溪文化成为两湖平原占主导地位的考古学文化。而在这一时期，汉水以东存在着一种区域性的，同样以红陶系为主的文化，即边畈文化（指钟祥边畈遗址第一、二期遗存），这实际是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的余绪。而至距今6000年或稍晚，大溪文化越过汉水向东发展，分布区域大大扩展，将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往北压缩，从而形成了鄂西南的关庙山类型、洞庭湖西北岸的划城岗类型（或称三元宫类型）、汉水以东的油子岭类型，会上有代表提出还可增加一个洞庭湖北岸乃至武昌以东的车轱山类型，并认为其中关庙山类型处于核心区域，代表最典型的大溪文化，而其它几个类型均较多地包含有相邻其它文化的因素。至大溪文化第四期，这几个类型更加趋同和接近，并由东向西，程度不同地接受长江下游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如由红陶系转变为以黑陶系为主，鼎、壶、豆等器形和弦纹的流行，石钺的使用等，开始孕育出屈家岭文化，并最终转变为屈家岭文化的几个地域类型，即汉东的屈家岭类型、鄂西南的关庙山类型（或称清水滩类型）、鄂西北至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湘西北的划城岗类型、孝感和黄冈等地区的螺蛳山类型。

两种观点根本对立，前者认为汉东以红陶系为主的油子岭文化不断冲击渗透，造成了大溪文化的消亡，源于油子岭文化的屈家岭文化最终替代了大溪文化。而后者认为，油子岭文化遗存实际是大溪文化发展到汉东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它终止了边畈文化的发展进程。因此，屈家岭文化是大溪文化晚期在发展转变过程中不断吸收长江下游众多文化因素的产物，从主体说来，两者属同一谱系。

会议期间，展示了湘江中下游、资水下游和沅水中上游近十年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收获。这些地区相同的都接受了洞庭湖区原始文化的巨大影响，但又存在着众多的差异，可以建立各自的文化谱系。湘江中下游和资水下游的文化谱系，湖南的研究者主张用南托（长沙县）文化、堆子岭（湘潭县）文化、岱子坪（湘乡县）一期遗存命名在石家河文化进入此地区之前的各个发展阶段，在编年上基本可以与洞庭湖区的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早期遗存（有人将其称为汤家岗文化，指皂市下层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一个阶段）、大溪文化、屈家

岭文化相对应。石家河文化进入之后,在这一地区形成岱子坪(湘中)和舵上坪(湘东北)两个地域类型。沅水中上游地区在石家河文化之前的原始文化,可依次用高庙(黔阳县)文化、松溪口(辰溪县)文化以及屈家岭文化高坎垄(怀化县)类型命名。在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一区域的北半部已是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而在南半部。则是与岭南同时期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竿篷坡(靖州市)中期遗存,或可称之为竿篷坡文化。

三、关于稻作农业的起源

70年代,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当时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由于其形态已接近现代的栽培稻,数量又十分巨大,并且伴出大量水田农具,所以不少人推测当地还应有更早的稻谷栽培历史,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中心,但目前在长江下游更早的稻谷遗存尚在探寻中。而在长江中游地区,随着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前段遗址的发现,这一课题已获得一定的突破。在距今超过8000年的彭头山文化的诸遗址如彭头山、李家岗、八十垱、坟山堡、城背溪、枝城北等地点,均发现了栽培稻的材料,因而不少研究者提出长江中游较之下游有可能更早出现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有代表认为,古地理学和地质学的研究表明,当彭头山文化在洞庭湖地区兴起时,太湖地区与苏、沪、杭平原以及余姚平原、宁波奉化平原等沿海地带,地貌是湖沼或浅海,这种地理环境不适宜水稻栽培。因此,河姆渡和罗家角成熟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外来的,而非在本地形成的。但多数与会者认为,将长江中下游视为一个大的稻作农业起源区,就目前的资料看还是较为妥当的。

有的研究者比较了以甌皮岩—黄岩洞为代表的华南地区和以彭头山—城背溪—皂市(下层)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距今10000—7000年间两个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及其发展的不平衡,并论证了生态环境的差别如何影响了早期农业发展的模式。在栽培稻起源的探索中,位于北纬 $25^{\circ}18'$ 的甌皮岩洞穴被认为是较有希望的一处,但在该遗址发掘及多次采样的资料中,至今未找到稻谷或可以说明栽培稻存在的物证;而目前发现栽培稻的几处早期遗址如彭头山、城背溪、河姆渡、罗家角,它们的地理位置都在北纬 $29^{\circ}36' - 30^{\circ}36'$ 之内。上述情况可以说明我国全新世初期稻作农业的最早发生,与温带地区一定纬度的生态环境有关。热带、亚热带的华南地区尽管有丰富的草木本植物资源,但发达的园圃农业模式造成了甌皮岩—黄岩洞遗址群农业发展的停滞性。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介绍了用现代技术手段和方法研究农业起源的进展。据日本学者介绍,用电脑处理得出的树枝状谱系图显示出不同类型栽培稻与野生稻的亲缘关系,从遗传学上来看是有远近区别的,这种遗传上的差距将野生稻和栽培稻分为两组,刚好与印度类型和日本类型对应。在日本稻类型中,不论是野生稻和栽培稻都有叶绿体DNA的存在,而印度稻类型中已没有叶绿体DNA的存在。基于这一事实,他们提出日本稻类型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观点。此外,目前一些遗传学家用水稻硅酸体的双峰是否对称来鉴别野生稻和栽培稻。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孢粉实验室通过对茶陵、江永的2种普通野生稻和19种栽培稻的水稻稻谷双峰硅酸体的观测分析,加上对28种稻谷表面形态的研究,发现所谓双峰硅酸体,实际上是稻谷表面的小刺状突起,栽培稻和野生稻的双峰硅酸体都存在对称与不对称的状态。如何利用双峰硅酸体区别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长江中游早期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来,在长江中游地区陆续发现了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天门石河、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等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其中石河城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其余几座城址面积均在10万平方米左右。城头山城址已作了4年的连续发掘,揭露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对东、南、西南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出500余座墓葬,清理了多座有台基的房址以及完整的制陶作坊区和城中大道。其它几座城址或解剖了城墙,或试掘了城内的墓葬、居住址。城头山城址的筑城时代初步定为屈家岭文化早期,距今超过5000年,与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大体同时。另外,部分会议代表在现场考察时根据城墙解剖剖面提出,此城应为两次修筑,第一次筑城与大溪文化中期挖造的大围壕同时,超过5500年。作为4次发掘的主持者,我们在发掘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思考,今后准备再选择重点部位发掘重新加以检验。其余4座城可能为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筑造,废弃时间则均在石家河文化中期。

与会代表对这些早期城址兴废过程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原始农业是文明诞生的基础。长江中游稻作农业从距今9000年甚至更早即已出现。全新世中期,约在距今8000年左右全球性气候转暖,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4℃左右,这种气候更利于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繁衍,加上农业工具的改进,因此,从大溪文化开始,长江中游以水稻栽培为主体的原始农业有了更迅速的发展,产品出现了剩余。遗址分布密度增加,部分地区遗址呈现群状分布,聚落形态有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中心聚落和半从属聚落,还出现了专业性生产制作中心的遗址(如红花套遗址即可能是一处专业的石制品制作中心)。在上述背景下,出现城址不仅成为可能,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除此以外,作为外部因素的影响,大溪文化晚期,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呈现更加开放的态势。一方面大量接受长江下游同时期先进的文化因素,制陶技术、玉石制造技术、建筑技术以及农作技术都有重大发展。另一方面,又大举向北扩展,更多地与中原同时期文化交流融合。这种整体运动的态势,是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迅猛发展的外部因素。目前发现的5座城址,都是位于所属文化分布的的腹心地区。这一事实,证明此时城址出现的直接动力,不是因外部势力的侵入,而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

对于这批城址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城址筑造的屈家岭文化时期是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统一性最强的时期,城址与其附属聚落彼此之间有着先天的或历史的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特权阶层主要限于政治、军事、宗教上的权力。城址是中心聚落与其附属聚落共建共享,用以抵御争夺生存空间和财富的敌人。城乡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输送技术、交换产品及联姻和文化交流的关系。因此这类城址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是氏族制的高级阶段,即部落军事联盟阶段。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不设防的聚落到环壕聚落,再到建有城垣的城,是聚落形态变化的三个阶段,即由社会尚未分层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到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原始宗邑聚落形态,出现了中心聚落和从属聚落,进而出现了原始国家形态的城邑,即有人所称的“酋邦”或“古国”。城垣不只是建筑行为,也是政治行为,是权力的象征和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几座史前时期的古城,开始是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后来出现了凌驾于其它城之上的城,如规模达100万平方米的天门石河古城,似乎表明这一地区的史前民族——苗蛮集团已形成了其权力中心。至于长江中游5座古城在石家河文化中期均趋衰落乃至废弃的原因,认识基本相近,即认为由于这一地区民族

集团和文化的向北推进和一个大区域内权力中心的形成，从而引发了与中原华夏民族集团的大冲突，最后以失败告终，其在古史传说上的投影就是“禹征三苗”。

五、关于史前时期的精神产品及原始宗教

长江中游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在文化遗存中就出现了用物态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产品。如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和长沙南托大塘遗址所出 7000 年前的彩绘、刻划、篦印的神兽、太阳、凤鸟等纹饰的陶器，6500 年前安乡汤家岗遗址下层出现的各种饰复杂图案的印纹白陶盘，距今 5000 年的安乡划城岗屈家岭文化早期墓葬所出朱绘石钺，距今 4500 年左右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神像、龙、凤、鸱鹰、琮、璧等大量玉器以及陶塑人物、禽兽。会上有代表提出，对这些人工制品应从考古类型学按实用功能分类的框架中分解出来，将其置于史前人类意识形态的范畴中去考察，主张采用苏秉琦先生所提“艺术神器”的名称来表述和研究。同时，根据这些艺术神器的外观和艺术纹样，可将它们划分为寓意于灵、寓意于神和寓意于人格神三大类别。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为界，此前的艺术神器上不见神人的图像，以后的神器则已赋予了人格神的力量，从而成为古代文明业已发源的一个重要表征。

就距今 7000 年前后以洞庭湖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史前白陶（主要器形为圈足盘）所进行的论述。有代表认为白陶的器表装饰是贴塑法制陶工艺印迹的美化和升华，属雕塑型。其外表繁密精美的纹饰，只能在“举案齐眉”的状态时才能展现，应是“事神以致福”的礼器。汤家岗遗址出土的数件白陶盘外底的八角星图案很有代表性，它是一幅仰视的图像。岳阳坟山堡遗址皂市下层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八角形镂空垫座，应是八角星纹的早期形态，而安徽含山凌家滩玉牌上的图像，则是八角星的发展。不仅良渚玉琮的仰视展开图与此相近，在妇好墓及齐家文化铜镜上亦可见到类似的图案，在吴县澄湖古井中出土良渚文化贯耳壶上铭刻的刻划符号中也有它的形象。推测八角星图案中寄寓着“方位”或“天地”等有关的东方文化观念，进而认为白陶开始的以雕刻型装饰为特征的礼器系统，才是铜礼器的直接前身。

此外，提交会议的论文和发言中还涉及到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周邻（长江下游、岭南、中原）同时期文化的关系，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在中国文明乃至亚洲文明中的地位等问题。

（原载《考古》1996 年 2 期）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中的几个问题

张森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有 80 多年历史,经几代人的努力,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毕竟取得了丰硕成果,令国际史前学界不能忽视这块亚洲东方广袤土地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工作。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是十分曲折的,它与国家、民族命运以及与国内大环境紧密相联,曾经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从本世纪 30 年代中前期的周口店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也是最辉煌的时代,抗战时期,几无发现,从 1942 年到 1948 年,研究成果亦甚微。尽管我们的工作多灾多难,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工作人员立足于国内,面向世界,吸取有益的经验,艰辛地工作,不断地推动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一些学术观点和工作方法在国际史前研究中曾起到过良好的影响。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在经历了草创时期(工作基本上是外国学者做的)和建基时期(以 30 年代周口店工作为代表,初步创建了一套符合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实际的工作方法、名词术语和研究思想),现已进入发展期,特别是近 15 年来,地方专业干部的成长,工作向更广更深方向发展,逐步由以器物为中心向着以遗址为研究中心的方向前进,中国南方的大面积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使人认识到中国南方与北方(大体以秦岭为界)在旧石器时代存在不同的主工业或主体文化,两者在很早时期就存在文化交流,提出“南阳通道”的看法(张森水,1988);在主工业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区域性文化类型,且有类型渐趋多样的情况;在旧石器考古试验研究方面,进一步开展打击石制品的研究,以观察碎骨为基础,进而对敲骨取髓、打击骨器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埋藏学研究也渐渐引起旧石器考古学家的重视,从中得到史前人类活动的有益信息。发掘方法,随着国际史前学方法的发展,在我国,工作也越做越细。

随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发展,许多问题自然地被提了出来,如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差异及东南亚文化区划、历史发展不平衡出现的时间和成因以及中国旧石器类型学、分类原则与规范术语问题等。本文仅就前两者的部分问题谈点笔者之孔见,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关心这方面的研究。

一、东南亚旧石器时代前期(指早期和中期)主体文化区划

莫维士(Movius, H.)教授曾将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划分成两个文化群体:手斧文化群体和砍砸器文化群体,前者代表西方(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后者则代表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主体文化,但从莫维士的论文中,则不限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旧石器时

代早期,对印尼的巴及托文化(Patjitanian)的时代,他推测“很可能是中更新世,或至少是晚更新世早期”(Movius, 1949),对缅甸的安央特文化(Anyathian),他认为“主要发生于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早期”(同上)。按我国旧石器考古断代与地质时代对应,还应包括旧石器时代中期,为便于讨论问题,在本文中用了旧石器时代前期一词,以便与暂定的、印尼和缅甸发现的材料在时间上相吻合。

对莫维士旧大陆旧石器时代前期文化区划的理论,尽管国内外考古学家持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从历史角度看,无疑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两个群体说,从更大的空间阐明旧石器时代前期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若从目前旧石器时代前期考古研究成果看,无疑是简单化了。因为无论东方或西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均有多样性,其前期,主体文化与非主体文化交叉地分布着。在西方典型的手斧文化区,也存在以小石制品为主的文化区;在东方,砍砸器文化区,旧石器文化更具多样性,存在不同文化传统镶嵌分布的多元结构。

莫维士的理论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有其历史背景。这就是本世纪30年代东南亚旧石器的一系列重要发现。首先是周口店第一地点石制品的发现与研究(Pei, 1931),继之,德日进和裴文中对周口店中国猿人石器进行了初步综合研究,他们指出:“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是中国境内真正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化,它是这个典型地点以外未见报道的一种旧石器文化”(Black, et al, 1933)。从这段论述似可揣测他们已意识到,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是与西方同期的以手斧为标志的文化是不同的。对此,裴文在稍后作了更明确的阐述,如“欧洲史前人类主要工具的形态特点及其分期,尚不见于中国”(Pei, 1937);“史前文化本身难以将中国的和欧洲的进行对比,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石器制造技术有很大的不同”(Pei, 1939)。这些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看来这些观点对莫维士理论的产生不无影响。另从他把他把周口店中国猿人石器归入砍砸器群体中,也表明他受当时周口店旧石器时代前期(包括周口店第15地点)文化研究影响之深,因为在当时,对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带C (Zone C),即主堆积的下部的石器,在那里,砍砸器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是有代表性的石器类型之一。此外,在莫维士论文(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所用插图亦引自德日进、裴文中或裴文中发表的论文。由此可知,莫维士理论的提出与周口店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周口店同时或稍后,在东南亚有一系列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前期文化遗物的发现。1928年印度地质调查所瓦达埃(Wadia, D. N)注意到索安(Soan)河谷有丰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至1936年戴兰(de Terra)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旧石器文化,他命名为索安文化,这是他和彼德森(Paterson, T. T.)和德日进等几年工作的结晶,这一文化的重要遗址发现于今属巴基斯坦的索安河流域的阶地堆积中。1935年孔尼华(von Koenigswald)和特维梯(Tweedie, M.)在爪哇中南部巴及托地方找到一批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前期的石器。本世纪30年代初,莫利斯(Morris)首先在缅甸发现旧石器,继之于1937—1938年美国东南亚早期人类联合考察团发现新的无手斧的也被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前期的石制品,并命名为安央特文化(Anyathian)。莫维士本人研究了印尼和缅甸发现的石制品。通过他自己的研究和当时周口店的和索安的已发现的文献,他认为在东南亚前期旧石器文化中砍砸器占有重要地位,与同期的西欧旧石器以手斧为主要类型的文化显示出鲜明的不同。在东南亚,手斧或没有,或数量不多且不甚典型。依笔者揣测这就是莫维士两个文化群体的考古学依据或其历史背景。

莫维士虽提出不可忽视的上述理论,但仍存在依据不充分、基础不坚实的问题,随着东南亚旧石器考古的发展,越来越显得明显。首先,无论是印尼的或缅甸的旧石器都是采自地表,无地层依据,也没有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为其断代提供支持,即使在当时也有人怀疑它

不一定是一个时代的遗物，莫维士本人也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对其时代留有相当的宽容度。其次，如上述，在本世纪30年代初，对中国猿人石器研究偏重于文化带C，对A、B两带的石制品记述仅寥寥数语，从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砍砸器是其主要类型。后来的研究表明，砍砸器在中国猿人早期文化中是具代表性的石器类型，占本期石器总数的32.28%，但总体而言，在中国猿人文化中，砍砸器并不具典型性，只是次要类型，占石器总数的5.42%，不仅次于主要类型刮削器，也次于较重要类型尖刃器，后两者分别占石器总数的75.49%和13.74%^①。由此可见，把中国猿人文化（包括周口店第13地点石制品和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第15地点的石制品）归于砍砸器文化群体中，现在看来，有失偏颇。其三，关于索安文化，莫维士也将其归于砍砸器文化群体中显然是失当的。且不说，索安文化的详细研究报告是在莫维士理论提出后十多年才发表的，但在三十年代末，索安文化研究者们就已指出在索安文化中存在阿舍利手斧，在第三冰期时，出现具有勒瓦娄哇技术特征的石片。关于这一点莫维士也不否定，并略有记述。索安文化无论从其分布区、石器类型或加工技术的发展趋势看，都与印度旧石器时代前期以手斧为典型器物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若以手斧为主要类型和勒瓦娄哇技术应用作为区分东西方旧石器文化群体的重要的标志，其归属问题是清楚的。尽管莫维士理论有基础欠坚或不足之处，但其理论仍是瑕不掩瑜，其历史功绩是不会泯灭的。

莫维士理论发表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东南亚旧石器时代考古有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近15年来中国南方的一系列发现，使得中国南、北方旧石器工业“没有区别的看法”（Watanabe, 1985）成为过去，中国南方与北方存在不同的旧石器时代主体文化已毋庸置疑；近年来泰国旧石器考古也有长足进步，使对东南亚旧石器时代前期文化区划问题的讨论成为必要，也有一定的可能性。诚然，目前讨论东南亚旧石器时代主体文化的文化区划问题，基础仍然不太好，印尼和缅甸仍只能依旧材料，泰国的材料详细研究报告尚未发表，中国南方调查采集的石制品远多于正式发掘出土者，空间缺环也多，因此，目前的管见仍然是初步，有待今后工作来验证和修正。

本文所采用的加工技术和类型术语都是大家能理解和常用的，故不多作解释，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将广西百色地区曾被有学者称为两面器的一类归于手斧类^②，将那些一面大部加工（常常是后跟保存砾石面），而另一面则仅有局部加工有尖的大型石器称为原手斧；另一是将南方旧石器文化研究中最常见的一类称之为大尖状器者改称为手镐。笔者的含义与西方一些类型学家对此类石器的定义略有不同，把它仅限于单面加工者，而前者强调手斧重修边，手镐重修尖，而从中国旧石器时代前期两类石器无法以此区分，即使在欧洲，以此区分两类实际上也是很难的。因为，一般来说，两面两边认真修理后相交的尖刃也是锐利的，除非是较晚的阿舍利文化手斧，有钝尖的、甚至无尖的。手镐，依目前中国南方发现的情况，主要是用砾石（包括石核）做的单面加工的、有尖的大型重型石器，且两边大部可见加工痕迹，若两边加工仅见于尖端部位（少于边长1/5）或一边修理细致，另一边仅见一或二下粗糙打击成尖刃者将其归于原手镐类，代表手镐中未制成但有尖可用的一类。此外，在莫维士分类中有Chopper和Chopping tool两类，依我国旧石器现行分类，统归砍砸器类中，笔者曾提出依石制品上最后产生的人工痕迹（包括石器最后的成型）作为分类依据，这样做也是合宜的。

从东南亚旧石器时代前期考古资料来看，粗略地可划分为三个主体文化区：中国的北方区、中国的南方区和缅甸、印度尼西亚区，以下简述各区在石制品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特点。

中国北方区